

邹振环◎著

晚明汉文西学经典：

编译、诠释、流传与影响



复旦大学出版社
www.fudanpress.com.cn

高等学校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明清西方文化摄取史研究”（批准号：200114）最终研究成果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批准号：10JJDZONGHE024）中期研究成果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晚明汉文西学经典：

编译、诠释、流传与影响

邹振环◎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www.fudanpress.com.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明汉文西学经典:编译、诠释、流传与影响/邹振环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9
ISBN 978-7-309-08319-4

I. 晚… II. 邹… III. 文化交流-文化史-中国、西方国家-明代
IV. K244.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52825 号

晚明汉文西学经典:编译、诠释、流传与影响

邹振环 著

责任编辑/史立丽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6.75 字数 416 千

2011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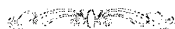
ISBN 978-7-309-08319-4/K·345

定价:4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 言 001

- 一、汉文语境中“西学”概念的出现 003
- 二、变动概念的“西学” 007
- 三、“汉文”与“西学经典” 010
- 四、“编译”、“诠释”、“知识”与“知识场” 018
- 五、“知识对话”、“知识互动”与“本土性知识” 023
- 六、本书的问题意识与结构 026

第一章 利玛窦世界地图的刊刻与明清士人的“世界意识” 032

- 一、利玛窦世界地图刊刻与传播的主要系列 033
- 二、利玛窦世界地图所引入的新知识点 047
- 三、明清间士人对世界地图的回应和早期“世界意识”的形成 059
- 四、利玛窦世界地图在晚清西学知识重建过程中的意义 072
- 五、本章结语 077

第二章 明清知识场域中的《交友论》 082

- 一、晚明讲学游学之风与《交友论》译刊的时间、地点与形式 083
- 二、《交友论》的内容与体例 087
- 三、《交友论》在明清间知识场域中的影响 092
- 四、王韬的《择友说》和谭嗣同《仁学》中的“朋友观” 098
- 五、本章结语 101

第三章 《天主实义》、《畸人十篇》、《七克》：新知的表述与 旧壳的对话 102

- 一、交谈式演说体的《天主实录》与《天主实义》 104
- 二、对话体以寓言格言证道的范本《畸人十篇》 117
- 三、哀纂体知识“证道”“劝善”的《七克》 129
- 四、天主教汉文经典在晚清的重刻与形式及术语的借用 144
- 五、本章结语 152

第四章 《几何原本》：历经两个半世纪的翻译诠释 156

- 一、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六卷的译出 157
- 二、《几何原本》演绎体系与清前中期中国数学家 162
- 三、《数理精蕴》与《几何原本》满文译本 167
- 四、《几何原本》的续译与上海新知识运动的掀起 171
- 五、韩应陛与续《几何原本》的刊行 177
- 六、金陵书局版《几何原本》全帙的刊行与张文虎的贡献 179
- 七、晚清知识者的学术互动与《几何原本》续译续刻的意义 182
- 八、本章结语 187

第五章 《泰西水法》、《同文算指》：在工具性知识层面会通 中西 191

- 一、《泰西水法》的译者徐光启与熊三拔 191
- 二、《泰西水法》的译刊与晚明的农业科学实验 194
- 三、李之藻与《同文算指》编译 205
- 四、《同文算指》与《西镜录》 212
- 五、徐光启、李之藻在工具性知识层面会通中西的努力 213
- 六、《泰西水法》、《同文算指》与晚清学界 217
- 七、本章结语 221

第六章 《西学凡》与《童幼教育·西学》：西方学科知识的传入 223

- 一、最早传入的佛教分科知识及其受容 224
- 二、《西学凡》所介绍的西方学术与知识分科系统 225
- 三、高一志的《童幼教育·西学》中所介绍的西学分科知识 233
- 四、欧洲人文主义教育的兴起与耶稣会知识体系 238
- 五、耶稣会教育与学术分科知识在明清间的介绍与影响 242
- 六、晚清艾儒略“六科”知识的再讨论与西方学科的新认识 247
- 七、本章结语 252

第七章 艾儒略与《职方外纪》：世界图像与海外猎奇 255

- 一、“西域奇人”艾儒略及其传述“异闻”的编辑策略 256
- 二、《职方外纪》的版本、底本与资料来源 260
- 三、《职方外纪》绘制的世界图像及其引入的新奇知识 263
- 四、《职方外纪》刊刻与明清国人的“世界意识”与“海外猎奇”的趣味 277
- 五、本章结语 286

第八章 晚明尚“奇”求“俗”文化中的《远西奇器图说录最》 289

- 一、晚明“奇人”王徵与邓玉函 290
- 二、《远西奇器图说录最》的内容与结构 293
- 三、《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中介绍的海外“奇人”与“奇书” 301
- 四、明清《远西奇器图说录最》版本与影响 306
- 五、晚明尚“奇”求“俗”的趣味与《奇器图说》流传之原因 310
- 六、晚清“器多奇巧”时代流传的《奇器图说》 314
- 七、本章结语 318

第九章 《泰西人身说概》与“脑主记忆说” 319

- 一、《泰西人身说概》的版本、内容与结构 320
- 二、《泰西人身说概》的译述与润饰 327
- 三、《泰西人身说概》的资料来源 333
- 四、《泰西人身说概》与《洗冤录》 336
- 五、《西国记法》与西方流行的记忆术 341
- 六、晚明至晚清“脑主记忆说”新知识话语系统的形成 344
- 七、本章结语 351

第十章 《火攻挈要》：晚明至晚清火器技术知识的转移 355

- 一、《火攻挈要》的编译者、资料来源与版本 356
- 二、《火攻挈要》的内容与特色 364
- 三、晚清火炮技术的发展与《火攻挈要》的新诠释 375
- 四、本章结语 3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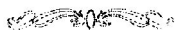
全书结语 386

- 一、编译方式和原本选择 388
- 二、传送的新知识和新术语 389
- 三、诠释的方法和特点 390

引用文献 395

后 记 420

导 言



晚明以来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其间中国思想学术演变之根本原因是因为与西学的碰撞。近代中国学术的整体取向基本是以西学为主导衍生和发展起来的,不用说魏源、徐继畲、康有为、梁启超等近代思想家无一不是西方各种知识和思想的积极传播者,即使号称“国粹派”的刘师培、邓实等学者们,在讨论中国古代的思想与传统,也都是以西学作为比较的背景,基本思路中有着极其浓厚的西学研究的方法^①。中国近代的知识传统很大部分来源于西学,而西学在各个时期又有多个系统的来源,有晚明以来天主教系统的西学;有晚清西方新教传教士带来的西学;有从日本转道而来的西学,也有从苏联输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西学。本书所涉及的主要是晚明以来天主教系统的西学,当然与晚清西方新教传教士带来的西学又有着密切的关联。20世纪80年代以来,笔者注重于西学东渐史的研究,在中国传播的西学究竟有无自身的统宗——学术脉络呢?这一问题多年来一直困扰着自己:如果中国的西学是有统有宗的,那么其统宗——学术脉络究竟在哪里呢?1999年和2007年笔者先后完成了西学东渐史中地理学和历史学的研究^②,关于中国的西学有无自身统宗的看法渐渐明晰起来:汉文西学学术脉络的源头,应该追溯到距今近四百年前晚明



① 1905年《国粹学报》刊载的刘师培的《周末学术史序》就将中国古代学术和思想史的门类,按照西学,如心理、伦理、论理、社会、宗教、政法、计学、兵学、教育、理科等十六类重组和分类。这一思路被学者概括为“引西学以重新研究古学”,参见李帆《刘师培与中西学术——以其中西交融和学术史研究为核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② 参见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邹振环《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以1815至1900年西方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晚明汉文西学经典：编译、诠释、流传与影响



002

的汉文西书^①。

“晚明”，有的西方学者用以指称“开始于16世纪20年代，并涵盖了明朝1644年春在北京覆灭之前的最后六个皇帝统治期”^②。从西方传教士的东来，特别是从汉文西学经典编纂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把“晚明”的时间确定在16世纪80年代至1644年可能更为合理，这一时期西方传教士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利玛窦到达澳门，并成功进入大陆开始了汉文西学经典的编译。笔者界定这一时间坐标的理由主要是出于社会、思想和知识关系的角度考虑。法国谢和耐将明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奇特的时期之一”，是继宋代的伟大“复兴”之后的第二次“复兴”。其具体表现为商业经济和生产技术的飞跃发展，由大小商人组成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出现，经济和社会问题引发了在文学和出版界的知识更新。这是一个文化沸腾、创新、高度好奇和思想自由的时代^③。它标志着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与学术发生了一个历史性交汇的重要时代的开端，也是绝大部分经典性的汉文西书集中形成的时期。“晚清”同样是一个不很精确的时间断限，“晚”是指清朝在政治上日薄西山，本书所使用的“晚清”大致相当于19世纪初到20世纪的百年间。这是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与学术再度发生全面碰撞、冲突和交融的重要时代。与晚明不同的是，这一时期已经缺失了晚明学者的那种从容，而整个中西文化的交汇是在满清政治的危机和接踵而至的西方列强坚船利炮之下急剧展开的。中国士人对西学的知识重建可以说是在鸦片战争后一系列战火的硝烟之中

- ① 20世纪80年代，日本学者就将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的译述称为“前期汉译西书”，将19世纪以后新教传教士的译述称为“后期汉译西书”。参见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页23。90年代笔者在讨论明末清初西方地理学输入问题上，最早使用了“汉文西书”的概念，主要用于指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用汉语撰写，或在中国人帮助下编译的有关西方内容的各类图书和文献，包括有原本参照的译著；或无原本依据、只是西方传教士依据西方概念和内容编写的各种图书。晚清的西学图书和文献，绝大部分有可参据的原本，因此使用“译著”这一概念。“译著”一词最早可能见之于《宋高僧传》卷十二：“摩腾入汉，译著斯文”，此系作为动词使用，至晚清比较普遍地用之于名词，如1898年邵之棠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统编》（光绪辛丑年上海宝善斋石印本）卷六“文教部”六有“译著”的专门分类。参见邹振环《西方地理学的学术挑战与中韩学人的应战》，《复旦学报》1999年第3期；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第一章。笔者至今仍认为这样处理，较之日人“前期”、“后期”的说法更为合理。本书行文中所述明末清初的汉文西书、汉文西学文献、汉文西学典籍、中文西学著作、汉译西学书籍，都属同一概念。
- ② [英] 崔瑞德、[美] 牟复礼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页674；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中指出，晚明是“一个思想史上的转型期，大体上断自隆万以后，约相当于西历16世纪的下半期以及17世纪的上半期”（东方出版社，1996年，页1）。
- ③ [法] 谢和耐（Jacques Gernet）《论16—18世纪的中欧文化交流》，[法] 谢和耐、戴密微等著，耿升译《明清间耶稣会士入华与中西汇通》，东方出版社，2011年，页113—114。



进行的,中国学者对晚明汉文西学经典的重新认识很大程度上也是带着军事上失败所形成的屈辱情感。这些对汉文西学经典的诠释,不仅与晚明有着截然不同的社会背景,即使与清初相比也有了明显的文化隔世之感。

因此,本书首先是关于这一统宗的源头——晚明汉文西学经典的研究,同时也是这些汉文西学经典刊刻、流传、诠释、影响,及其与晚清西学关联的一项初步探索。经典文本不能离开其所生成的社会时代,无法将之与其他不同文本之间的交互关联中切割出来,文本生成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脉络也无法被重构,本书的“关联”是指在流传过程中文本与不同时代读者之间在不断对话中产生变形,随着时间之轴的不断转变,经典文本与不同时代的读者展开了复杂的对话过程。笔者尝试把晚清学者如何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回应晚明汉文西学经典作为本书考察的一部分。关于“晚明”的西学东渐史,在目前学界的研究中,因为清中期以后的禁教而将之与晚清的西学东渐史的研究基本分离。本书旨在通过晚明汉文西学经典的研究及其流传和诠释,为这两个时段找到一个逻辑上影响的“关联”。

一、汉文语境中“西学”概念的出现

本书所要讨论的“西”,在中国传统文献中一般是从地理上加以认识的,包括“西域”和“西洋”,冯承钧曾有一比较精确的概括:“凡玉门、阳关以西的陆地,概名之曰西域;南海以西的海洋及沿海诸地,概名之曰西洋……迨至耶稣会的传道师到了中国以后,方开始渐渐以西洋的名称专指欧洲。”^①“西学”之“西”最初是从地域概念演化而来的一种“文化大区”(又称“文化世界”)的划分法。在文化地理学上亦称为文化地域或文化圈,它可以是以一定的经济体系、社会组织、行为系统、宗教信仰或人种语言等文化现象的差别所划分的地域,如中国文化区、欧洲文化区、印度文化区、阿拉伯文化区等,它是文化特质的区域分类,即一组在历史上形成的相类似的、内部有相互联系的文化所组成的一种共同体。一个文化大区大多使用同一种体系的语言,往往有比较相近的伦理教义或宗教信仰。中国历史上“西”的含义比较复杂,在古代主要指印度文化大区 and 伊斯兰文化大区,明清间的“西”是指欧洲基督教文化大区。这一文化大区一般又可分为以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等为主的天主教文化区,以俄国、希腊为主的东正教文化区,以及清

^① 冯承钧译序,〔法〕伯希和著,冯承钧译《郑和下西洋》,商务印书馆,1935年,页4。



中晚期包括英国、爱尔兰、荷兰、挪威及主要移民来源于此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新教文化区。

“西学”概念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其最早是指西域、西土或西方产生并到中国内地或东方流传的学说。中国人或东亚人所认识的“西方学问”或“西方学术”，或对西方学术的研究，也是当年西方人到中国来传授西方学问时常用的专门术语。就像西方人把他们自己研究的中国学问称为“汉学”一样，西方人在西方自己的研究中是不会将自己的学问称为“西学”的，西文中并无“西学”的概念。“西学”一词主要是在汉文语境中使用的，也可以表述为中国或东亚学者所理解和认识的关于西方的学问。在汉文文献中，据目前所知，“西学”连用为整词，最早大约出现在13世纪前半期的东亚世界。“西学”一词最早出现在中国人的著述中，可能是南宋李心传（1167—1244）记述高宗一代史事的史书《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其中卷一六六记载曹冠在廷试对策中所言：“凡为伊川之学者，皆德之贼也。又曰：自西学盛行，士多浮伪。陛下排斥异端，道术亦有所统一矣。”^①这里的“西学”显然是“释氏之学”，即佛学。新罗时代朝鲜的历史典籍中。成书于高丽忠烈王八年左右（1281—1283年）由僧一然所著的《三国遗事》之《圆觉西学》条目下，记有圆觉法师的形迹，另有《时义湘师西学入唐》的记事^②。此时的“西学”是指到“西国”、“西方”求学、研究“佛法”之意，是作为动词使用的，也是属于佛教范畴内的用语，因而此时所使用的“西学”与明末清初所引入的西学有着本质的区别。

目前所知，把含有基督教价值观、具有西方学问，特别是欧洲学术为中心的西洋学术称为“西学”，首先源自明末清初在华的耶稣会士。耶稣会士在其撰译的汉文西书中，把有关西洋的学问称为“西学”。这一概念最早的使用者可能是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Julius Aleni）。他所编《职方外纪》等三十余种汉文西书，其中有一本题为《西学凡》。该书1623年在

①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页324—327。南宋黄震（1213—1280）所著的考订经史子集之作的《黄氏日抄》一书中，在描述学校设置的古代东西南北郊之学时写道：“祀乎明堂，所以教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于大学，所以教诸侯之弟也。祀先贤于西学，所以教诸侯之德也。耕藉，所以教诸侯之养也。朝覲，所以教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西学者，西郊之学，春秋秋覲，礼行于此，人得于彼……”（黄震《黄氏日抄》卷二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第70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页689）

② 《三国遗事》卷4，义解第5，圆光西学；《三国遗事》卷4，义解第5，义湘传教。关于朝鲜西学传播史，韩国李元淳曾从朝鲜汉文文献的角度作过初步的探索。参见李元淳著，程玉洁等译，邹振环中文校订《朝鲜西学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杭州刊刻,是一本介绍西方的教育学、大学的学校体制和“建学育才”的方法,有关西洋教育和学术的“概说”^①。1605年来南京定居并主持南京天主教會的耶稣会士高一志(Alphonsus Vagnoni,后改名为王丰肃,1566—1640),共著述了15种汉文西书。大约在17世纪30年代,他完成了三部著作:《修身西学》、《齐家西学》和抄本《西学治平》(或称《治平西学》,该书续论为《民治西学》)。《修身西学》和《齐家西学》涉及西洋伦理学,《西学治平》和《民治西学》涉及西洋政治学^②。《修身西学》一书1630年刻于绛州,共十卷。《齐家西学》可能刻于1624年后,或称在1635年,其形式是模仿“大学”的结构^③。

晚明的“西学”可以界定为:由外来传教士和中国合作者编译的经过天主教改造过的希腊罗马时代的古典文化、中世纪的文化,以及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两次意义重大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以后出现的部分学问。荷兰学者许理和将“西学文献”涉及的范围大致归纳为四个方面:(1)宗教文学,其中包括论辩性的文章;(2)实践伦理学(如关于友谊和教育的论述和谚语格言集);(3)旨在“提高欧洲地位”的著作;(4)关于科学技术的著作。其特点一方面是表达了耶稣会士的知识财富,一方面也是他们出于传教策略需要进行精心选择的产物^④。“西学”在明清以来表述为“泰西之学”^⑤、“利氏

① 《西学凡》反映了西方耶稣会士在晚明曾与中国学者酝酿过一个庞大的译书计划。利玛窦传教主张的忠实执行者金尼阁1613年奉命回到欧洲,漫游了意、法、德、比、西、葡等国,每到一地都募集新书和仪器,在教皇的支持下,他收集了有关宗教、哲学和科学的西书共7 000部,1619年7月15日运抵澳门。以后他与艾儒略、杨廷筠、李之藻等商议全面的译述计划。1623年艾儒略以答述的形式,分文科、理科、医科、法科、教科、道科六部分,对7 000种作了提纲挈领的介绍,编成《西学凡》,声称要“与同志翻以华言,试假十数年之功,当可次第译出”。杨廷筠更是兴奋地在该书序中写道:“所称六科经籍,约略七千余部,业已航海而来,具在可译,此岂蔡愔、玄奘诸人近采印度诸国,寂寂数简,所可当之者乎。”他也要求能“假我十年,集同志数十手,众其成之”。参见杨廷筠《刻西学凡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93册,页627。不过也有学者对上述7 000部的说法有所怀疑,认为可能是7 000卷,甚至认为金尼阁在欧洲所筹的款项不足以采购到7 000卷的数目,指出这一说法是“为了凑一个整数”。参见〔法〕惠泽霖(Hubert Verhaeren)《北堂图书馆的历史变迁》,〔法〕谢和耐、戴密微等著,耿升译《明清间耶稣会士入华与中西汇通》,东方出版社2011年,页155。

② 徐宗泽编著《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标点本,页164—171。

③ 参见张西平称《修身西学》,此书现藏于梵蒂冈图书馆,参见氏著《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东方出版社,2001年,页112;〔法〕梅谦立《明末清初的西哲东渐》,中山大学西学东渐文献馆主编《西学东渐研究》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8年,页64。

④ 〔荷〕许理和著,辛岩译《十七——十八世纪耶稣会研究》,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四辑,大象出版社,1999年,页429—447。

⑤ 王重民辑《徐光启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页66、80。



西来之学”^①、“西洋之学”^②、“西来天学”和“西贤之学”^③、“西方之学”^④、“西庠之学”^⑤、“远西学”^⑥、“泰西人之学”^⑦、“西人之学”^⑧等；也有将利玛窦称之为“西泰之学”，指“西泰子”利玛窦个人之学问的意思^⑨。当时的西学也用其他术语来表述，如“天学”^⑩、“实学”^⑪等，也有保守派的学者称之为“异学”^⑫。上述“西学”在各种文献中尽管使用的意义有别，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在晚明天朝中心的框架内，欧洲之“西方”已经取代了印度之“西学”，明末清初在中国“西学”一词成了耶稣会士们把西方学术著作译成汉文时普遍使用的学术词汇。当时与后世的中国学者或东亚学者，无论是支持和同情者，还是怀疑和反对者，都在汉文文献的撰写中直接沿用了这一用语，将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学问称为“西学”。今天我们也用该词来泛指 16—19 世纪通过西方传教士介绍给中国的西方学术、西方知识或西方的知识体系。构成反映这一部分内容的文献，可以统称为“汉文西书”。正是在这一西学

- ① 杨廷筠《刻西学凡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 93 册，页 628。
- ② 郑以伟《泰西水法序》，《泰西水法》，嘉庆庚申年扫叶山房版。又见杨光先《肇镜》，《不得已》，黄山书社，2000 年，页 57；王弘撰《山志》卷一“西洋”条称：“大抵西洋之学专奉耶稣，于二氏外别立宗旨，其与吾儒悖均也，然天文奇器则独长。”（《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 115 册，页 91）
- ③ 杨廷筠《代疑续篇》卷下，第十五节《跖实》，郑安德编《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第三卷，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2003 年，页 238—239。
- ④ 许胥臣《西学凡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册 93，页 628；参见徐宗泽编著《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页 229。
- ⑤ 周炳谟《重刻畸人十篇引》，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页 503。
- ⑥ 方以智《物理小识·自序》，商务印书馆，1937 年。
- ⑦ 如朝鲜学者洪大容在使用“泰西人之学”这一用语的同时，也使用“西学”这一用语。他对“西学”兴起的原因作如下界定：“康熙末来者益众，主仍采其术。为《数精[理]精蕴》书，以授钦天监为历象源奥。建四堂于城中以处其人，号曰天主天象台，是西学始盛。”（《湛轩日记》卷一，刘鲍问答）参见李元淳著，程玉洁等译，邹振环中文校订《朝鲜西学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年，页 5。
- ⑧ “若望以四十二事表西法之异，证中术之疏，由是习于西说者，咸谓‘西人之学’，非中土之所能及。”（阮元《畴人传·汤若望》第四十五卷，参见阮元等《畴人传汇编》，广陵书社，2009 年，页 530）
- ⑨ 《河滨集》卷二，“内篇”纪闻编·星湖纪闻。
- ⑩ 李之藻 1628 年编有中国第一套西学丛书《天学初函》，朝鲜安鼎福有《天学考》、《天学问》，李献庆有《天学问答》等，所对应的内容大致与李之藻《天学初函》所涵盖的内容相似。
- ⑪ 有学者将“西学”与“实学”并列讨论，如方中通指出：“实学之失，患在才人不讲，更患在博物君子，标其大纲陈迹，而不穷其所以然，令周公、商高之法，不尽传于今，中学隐而西学彰。”（《陪古》卷一“中西算学通序”）
- ⑫ 如《四库全书总目》在评论《西学凡》一书时指出该书“文科如中国之小学，理科则如中国之大学，医科、法科、教科者，皆其事业。道科则在彼法中所谓尽性至命之极也。其致力亦以格物穷理为本，以明体达用为功，与儒学次序略似。特所格之物皆器数之末，而所穷之理又支离神怪而不可诘，是所以为异学耳。”（《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上）》，中华书局，1997 年，页 1673）



东渐合法的框架内,大量的新术语词汇得以出现在这些汉文西书中,成为晚明以来中国学界理解西方科技、伦理和基督教的专门知识的概念工具。

二、变动概念的“西学”

在汉文语境中使用“西学”,是一个变动的概念。早在明末徐光启就把利玛窦所传之学分为三类:“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穷理,物理之一端,别为象数”^①。按照我们今天的学科分类,“大者”显然是指神学、哲学,“小者”指物理学、机械学等,“象数”之学指数学。李之藻则将晚明传入的“西学”称为“天学”,并将之分为天主教教义和科学技术两部分^②。徐光启和李之藻关于“西学”的分类法多被后来的研究者所遵从,如徐宗泽在讨论耶稣会士著述的分类时指出:“西士遗留于吾人之书籍,大纲可分为宗教及科学两类,其细目亦可分析言之:宗教书中有论道理及讲修成之书,有辩论、辟迷、释难、解惑之书,有圣人行实,及圣教经文等书。科学书中,有天算、地舆、水学、哲理、小学、形下学等等”^③。钱存训则将1584年至约1790年间的耶稣会士所译出的“西学”,分成基督教(圣经、神学、仪式、史传、杂录)、人文科学(哲学和心理学、伦理、政府、教育、语言和字典、文学、音乐、地理和舆图、杂录)、科学(数学、天文、物理、地质、生物和医学、军事科学、杂录)三大类^④。

19世纪末关于“西学”概念的讨论曾出现过高潮。1874年郑观应的《易言》中专门有一篇文章,题为《西学》,其实该篇是西方学校制度的介绍,他介绍了西方的大学院的分科为经学、法学、智学、医学四门,技艺院分汽学、电报、采矿、陶冶、制练、织造等,另外还有格物院、船政院、武学院、通商院、农政院、丹青院、律乐院、师道院、宣道院、女学院等^⑤。之后他觉得以学校制度来代替西学显然不合适。于是,光绪十八年(1892)的《盛世危言》一书的《西学》篇中,他把西学细分成天学、地学和人学三部分:天学以天为纲,包括“一切算法、历法、电学、光学诸艺”;地学以地舆为纲,包括“一切测量、经纬、种植、车舟、兵阵诸艺”;人学以方言文字为纲,包括“一切宗教、刑法、食

① 徐光启《刻几何原本序》,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页304。

② 李之藻1628年编有中国第一套西学丛书《天学初函》,将“天学”分成“理编”和“器编”,事实上即包括了明末传入中国的大部分西学内容。

③ 徐宗泽编著《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页1。

④ 钱存训著,戴文伯译《近世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文献》1986年第2期。

⑤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201—202。



货、制造、商贾、工技诸艺”^①，实际上是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主要内容。1880年有两位西方传教士提出了关于“西学”的概念，丁韪良在该年写出《西学考略》一书，主要将“西学”定位在西方科技；而同年发表在《万国公报》上艾约瑟《泰西诸国校塾》一文中称：“西国学问分三教，有身教、心教、神教。”^②1883年发表在《万国公报》上的沈毓桂《中西相交之益》一文，将“泰西学问一道分门别类”为史学、理学、经学、文字、格致、天文、数学、地舆、音乐、丹青十类，并强调“一国则有一国之法，万国则有万国之法。独是西国之法最精也，最深也，最全也，最大也”^③。同年，张书绅在《中西书院之益》一文中则把西学理解为天文、地理、数学、格学、化学、理学、重学、琴学、形学、心学、史学、力学、法学、智学、医学、农学、画学、矿学、光学、声学、八线学、身理学、是非学、植物学、动物学、航海学、冶金学、吸铁学、电气学、静重学、动重学、微分积分学等^④。

“西学”这一词汇渐渐成为学界流行用语，影响较大的有1885年艾约瑟的《西学略述》一书。该书分十卷，卷一训蒙，从字母、拆习字母、启蒙读物、书法、地理、音乐谈到如何调习幼童肢体，介绍西方的婴塾和义塾。卷二方言，有言语未易考原、辨识土语为考方言之助、字原出于图画、笔墨考、印度及欧洲方言考、西米底族考、土满蒙考、藏缅暹越考等内容。卷三教会，分混沌开朗、主理世界真宰、鬼神、神名为诗人所幻立、较诸教同异、开教诸圣、诸教圣书、各教所论处世之宜、灵魂不死、六道轮回、末日复生、幽冥之神、佛教分有南北、火袄教原、犹太教、耶稣教分东西、西教复分为二、礼拜等内容。卷四文学，简述西方诗歌的起源时也提到了荷马史诗，希腊文学的东传罗马、旧约对欧洲诗歌的影响、演讲术、论说、野史、长诗盛行的原因等。卷五理学，从希腊哲学伯拉多、阿斯多德到新伯拉多理学；述及的欧洲著名哲学家有法国代加德（今译笛卡儿）的“物序原于道序”说，德国雷伯尼兹（今译莱布尼茨）和干德（今译康德）的“三能十二思范说”，英国罗革（今译洛克）和休末（今译休谟）的“心学”以及斯本赛（今译斯宾塞）的哲学。卷六史学，主要介绍西方史学，在“史学考原”中提到了“希腊创著国史之人”希罗多都。卷七格致，分天文、质学、地学、动物

①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页272—276。

② 李天纲编校《万国公报文选》，三联书店，1998年，页473。

③ 同上书，页481—485。

④ 同上书，页505—506。



学、金石学、电学、化学、光学、重学、身体学、植物学、医学、算学、代数学、历学、风俗学等。卷八经济，分富国、租赋、富民、国债、钱制、河防、海防、法国经济始末、意国经济始末、筑路、船制、火车铁路、户口。卷九工艺，讲述了各国的绘画、雕刻、建筑、雕版印刷、铜版制作、乐论、演剧、汽机、棉布、绸缎、熔铁、葡萄酒、玻璃、钟表、煤气灯等内容。卷十游览，分航海遗闻、多禄某书、回人肇纪来华、波罗来华纪游、欧人西觅新地、游览直北来华水程、古革东游、欧人游览亚非利加全境等目；该卷的“游览”，并非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旅游，而是西方历史上的地理探险。

1888年发行量极大的有卢梯青和王西清同辑的《西学大成》，其他还有《西学启蒙》、《西学三通》、《西学军政全书》、《西学自强丛书》、《西学时务总纂大成》等。此时的“西学”概念已经拓展到将受西方影响的中国人的著述也收录其中，如1897年张荫桓编辑的《西学富强丛书》就包括了19世纪江南一些畴人学子所编纂的数学著述。1896年出版的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在综合前人讨论的基础上，对“西学”作了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广义的“西学”包括了西学、西政和杂类三部分。狭义的“西学”即西方的自然科学，包括了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汽学、天学、地学、全体学、动植物学、医学、图学；西政属于现在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包括史学、官制、学制、法律、农政、矿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等；杂类包括了游记、报章、格致总、西人议论之书和杂著等。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他再度讨论“西学”的概念，认为：“‘西学’名目，实自耶稣教会人入来所创始。其时所谓‘西学’者，除测算天文，测绘地图外，最重要者便是制造火炮。阳玛诺、毕方济等之见重于明末，南怀仁、徐日升等之见重于清初，大半为此。”^①1898年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一方面将“西学”与“中学”相对，视为外来的学问，认为：“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②；同时又将西学分解为“天算西学”、“地舆西学”，以及“公法、矿学、水师、陆师、炮台、铁路”等“各种西学”^③，“天算西学”包括了中国人编的《数理精蕴》、《历象考成》等。事实上，19世纪后半期的“西学”已经不再只是由外来传教士和中国合作者编译的来自欧美的学问，而可以被理解为包括了中国人或东方人所认识和研究的西方学问。

① 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页121。

② 张之洞《劝学篇·会通》，冯天瑜等评注《劝学篇·劝学篇书后》，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页202—203。

③ 张之洞《劝学篇·益智》，同上，页131。



综上所述,所谓“西学”的概念无论有怎样的演化和变动,其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西方人在中国或东亚地区用中文介绍的西方学问,二是中国或东亚学者所理解和认识的关于西方的学问。两者的共同点,即都是在汉文语境中所进行的讨论。

16—18世纪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特殊的时期,较之元朝时期与西方的交流要充分得多,而较之晚清这一时期的跨文化交流,它又是在一种和平的环境中进行的,尽管当时欧洲已经开始了殖民扩张,但是其势力尚未波及中国,其在东方的活动尚未以坚船利炮作为后盾,基本上也没有能力在中国进行经济扩张。因此,这一时期中国人看待欧洲的文化主要是以一种文化眼光,在接受西学上有着很大的主动性,对待西方文化的心态基本上也是平和的。这一时期在华耶稣会士的传教特点是借助汉文西书。对于当时流传的《几何原本》、《职方外纪》、《远西奇器图说录最》,甚至《交友论》、《七克》等汉文西书,明末清初很多中国人尚能作出相对比较公允的评估。固然也有反教人士的活动,但与晚清国人极端激烈的反教态度相比,还是在面对西学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差别。近代中国人再度接触西学是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威逼下被迫进行的,在学习西学的过程中心态是不平衡的,救亡图存一直是学习西方过程中的一把悬剑。晚明所形成的这一批汉文西书是所谓“西学”的主要载体,与晚清的汉文西学译著确实有所区别,汉文西书的编译、诠释、流传,可以成为我们解读明清西学传播影响深度和广度的重要载体之一。

三、“汉文”与“西学经典”

明清间“汉文”的影响力与今天相比,实不可同日而语。汉文曾经是东亚世界的通用文字,是古代以中华文明为内核的东亚文化圈中最基本的要素。汉文不仅是中国境内各地区不同民族的书写文字,同时也是朝鲜半岛、日本、琉球、越南、菲律宾等地正式使用过的书写系统。在这一汉字文化圈中,人们可以通过汉字来实行有效的知识交流。以往学者已经注意到了汉文在儒家思想和佛教哲学等传播中的巨大作用,但很少有学者指出过,在明清时期汉文仍然是东亚世界的通用文字,其作用类似拉丁文在欧洲世界的地位。西学经典如同唐朝儒家经典和佛教经典在日本、朝鲜、越南的传播一般,明清间基督教思想和西学文献也是通过汉文媒介广泛流传到朝鲜、日本、越南等地,成为基督教文化在这些地区传播的主要媒介。同样,西方知